

論民主和專政

吳 黎 平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論民主和專政

吳黎平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論民主和專政

吳黎平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1\frac{7}{8}$ · 字數 42,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35,000 定價(7) 0.18元

統一書號 3001·510

封面設計者：牟萃東 校對者：吳季之

前 言

关于民主和专政問題，近来我国各方面人士曾經發表了不少意見。我也曾在报刊上陸續發表了三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是按預定計劃写成的，但却也具有一定的相互联系。“关于民主和专政的認識上的若干問題”一文，是說明关于民主和专政的某些一般認識問題。“論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产階級的民主”一文，是說明两种根本不同的民主的本質問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中广泛的階級联盟和长期的各党合作”一文，則是說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無产階級专政的一种具体形式——的两个重要特征。文章發表后，有些地方出版社的同志，曾函促印成小册分出版。我考虑到，这些文章或許有助于民主和专政問題的討論和理解，故特彙輯成这一小册子，希望讀者指正。

文章在报刊上發表时因篇幅关系有所刪节者（大部分是資料性的），在这里为把文意說得比較明显、完全起見，不作刪节了。

吳黎平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

目 录

一	关于民主和专政的認識上的若干問題·····	1
二	論資产階級的民主和無产階級的民主·····	11
三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中广泛的階級联盟和长期的各党合作·····	45

关于民主和专政 的認識上的若干問題

最近几个月来关于民主和专政的實質及其两方面的关系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热烈爭論。有些人以为“民主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有些人不同意这一意見，認為“民主是方法也是目的”，“爭取人民民主就是一項偉大的斗爭目的”，“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等等。澄清这些問題，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我在这里，提出一点討論的意見。

—

我們在討論和分析我国当前任何一个政治問題时，首先必須認識什么是我国政治的中心問題。在我們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切政治問題的中心，是：加强工人階級政党的領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無产階級专政的一种具体形式）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設事業。这是同一个問題的三面，是互相密切联系的，那一項都不能缺少的。我們如果真正想推进社会主义事業，就必须努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因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是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支柱和根本保證，离开了人民民主专政，什么建設社会主义的話都不能不成为空話或欺人之談。同样的，我們如果真正要在我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那就必須加强工人階級政党——共产党的領導，就必须要在党的領導之下，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各民主階級的联盟，加强国内

各民族的團結，加強各民主黨派的合作。離開了黨的領導，什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話，也只能成為空話或欺人之談。這是歷史所已證明了的真理。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有階級以來，全部人類的历史是階級鬥爭的历史。資本主義以前各時代的勞動人民（蓄奴制度下的奴隸，封建制度下的農奴農民）長時期地同壓迫階級鬥爭過，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的志士，在鬥爭中流洒了鮮血，付出了生命，但是在幾千年漫長的历史中，勞動人民一直沒有得到過解放。其根本原因，除了當時社會還沒有具備必要的生產力發展的条件這一點外，是在於勞動人民的鬥爭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領導，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遵循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使得勞動人民的解放，具備生產力發展的物質条件，同時又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工人運動之上，在那時思想發展的历史条件之下，第一次產生了真正能够引導勞動人民取得自身解放的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第一次產生了科學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工人階級政黨，只有自此以後，勞動人民的解放鬥爭才第一次擁有正確的堅強的革命領導，才第一次走上正確的道路——在工人階級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領導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這條道路。所以在我國、在一切社會主義國家，任何政治問題（包括民主的問題在內）都以是否真正加強工人階級領導，是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否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為區別是非的標準。民主的實質，決定於那個階級領導，為什麼階級的統治、什麼階級的利益服務。在社會主義國家，凡是加強工人階級政黨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民主，就是實質上正確的、適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民主。相反的，任何民主如果是削弱工人階級

政党的领导，削弱無产階級专政，削弱社会主义制度和事業，那么不論它采用什么“人民”或“革命”的名义和口号，都是違反广大人民利益的。这一点，革命的敌人是看得很清楚，而且也很会在这上面行使詭計的。敌人清楚知道只要排除了工人階級政党的领导，各种各样的民主形式和方法他們都可以利用来进行其反人民的活动。在俄国革命历史上，革命敌人曾企圖利用政权的民主組織形式——苏維埃，提出了“沒有布尔什維克的苏維埃”的口号，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反革命分子不也是經常利用“民族”、“民主”的口号来进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煽惑嗎？在不久以前的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中，帝国主义所派遣的顛复活动分子和匈牙利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不是利用“民族革命”，“民主化”的口号，陰謀使匈牙利民族重受帝国主义的奴役，使匈牙利国家法西斯化嗎？因此我們必須善于認識民主的實質，善于辨別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真实的民主，什么是敌对分子为着反对人民民主专政而用作借口的伪装的民主，而这一区别的标准，則就在于它是不是加强工人階級政党的领导，是不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从而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真正推进人民的幸福生活。如果离开这一根本的革命标准，离开根本的階級立場，离开对于實質的認識，那么泛泛地談民主，把民主絕對化起来，那就不仅不能为人民謀利益，反而会給人民带来極大的害处。

二

民主有两种意义：从政权的意义上說，是說人民的政权（民主专政），从組織原則的意义上說，是指有领导地發动广大群众、大家自觉的当家作主的組織指导原則（民主集中制）。这两項当然是互有密切联系的，同时也是互有区别的。我們在这里主要

是就前一項來說的。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具体形式，是真正人民的政权，它是人民的专政，它又是人民的民主，它对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阶层和一切反动派来说，是专政，而且是严格的专政，因为如不对他们实行坚决的有力的专政，不坚决彻底而准确地镇压帝国主义派遣分子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颠复复辟活动，那末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不能获得保证。同时，它对人民自己来说是民主，是广大的真实的民主，因为广大人民如不来共同管理国家，就不能有力地打破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颠复复辟阴谋，就不能很好地改造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小商品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专政和民主两方面都是为着同一目的：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加强劳动人民的革命统治，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从这上面说，无论是专政一面或是民主一面，都是革命的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工具、武器，也可以说是方法。因此很清楚的，不论专政或者民主的一面，如果运用得不恰当，越过了应有的界限，从而损害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损害了人民统治，那么这种武器、工具或者说方法，就是有害的，就不宜采用。相反的，如果这种武器、工具或者方法，运用得正确，从而加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巩固了人民统治，推进了社会主义事业，那么，它就是正确的，应当采用的。因之不论是民主或是专政，都是从属于人民的最高革命利益的，是要由这种利益来决定取舍的，本身都不能成为一种代表人民最高利益的自我目的。

（至于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和民主的问题，那么同样的，无论民主或者集中，本身也仅仅是加强革命人民力量，加强革命组织领导，加强革命政权工作，从而能够更好地谋求人民利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工具或方法。因此很清楚，它本身也并不

能成为一种自我独立存在的絕對化的最高目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須要另作較詳細的說明，这里不多說了。）

三

可是目的同工具、武器或者方法，是不能机械地絕對地划分开来的。虽然如上所說，民主或者专政，对人民最高利益來說，都不外是一种从屬性的工具、武器或者方法，可是在反动階級統治下，爭取这种工具、武器或方法的实现，本身又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革命斗争。不論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不論在反对法西斯血腥专政的革命斗争中，不論在反对帝国主义大資產階級的假民主、爭取人民的真民主的斗争中，不論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爭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民主都是偉大的响亮的斗争目的和口号。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或外国帝国主义的統治下，劳动人民不仅不能掌握政权，而且甚至不能享有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在反动的統治下，爭取和保衛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而在条件成熟时爭取人民民主的实现，本身就是—个偉大的革命目的。所以，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反动階級統治之下的人民的革命运动來說，民主又是代表当前斗争偉大利益的重要的目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或者专政的一面，虽然对人民和社会主义最高利益來說，不是目的，但是对許多革命工作、建設工作來說，則又是目的。例如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中，为着巩固各民族各民主階級的广泛联盟，为着加强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为着进行全国普遍的选举运动和加强政府机构的建設，为着加强社会主义企業和文化事業的民主体制，为着开展广大劳动群众的深入的劳动竞赛、先进生产者运动，为着在国家机构、政党組織、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中經常地开展深入的批評、自我批評，

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須要进行很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一个重大目的，就是加强社会主义建設的各方面的民主，而發動广大人民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民主管理，則更是我們革命工作者的經常的重大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說，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又是一定的革命工作的目的（当然它本身是以革命最高利益为依归的）。

因此，民主同时是目的，又不是目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認為民主是代表人民最高利益的超越于一切之上的目的，是錯誤的，同时，籠統地說民主都是方法，不是目的，也是不全面的、不妥当的。

四

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和专政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同时又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正因为专政是无产階級領導之下的劳动人民对于反社会主义的階級階層和一切反动派的专政，所以人民内部的民主、批評、自我批評愈是正确地發展，人民的革命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愈是提高，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的热忱愈是高漲，人民内部的团結愈是巩固，則人民对于敌对階級和一切反动派的专政，也愈是有力。这点在我国群众性的偉大的土改运动中，群众性的强大的鎮压反革命运动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点，在我国人民解放軍对敌作战时因正确实行民主而使战斗力更加提高的事实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点，在我国人民政权由于工作上依靠了广大群众由于正确开展人民内部的批評、自我批評因而日趋巩固的多方面實踐中，都可以得到确鑿的証明。人民的解放，是人民自己的事業，因此对于敌对階級和一切反动派的专政，也必須是人民自己的事業，也只有这样，这一事業才能真正获得成

功。反过来，如果不去正确地發展人民中的民主，或者甚至破坏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就不会有力量去对敌对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实行坚强的专政。这点我們在不久以前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事件中，不是已經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嗎？

另一方面，正因为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所以如果不坚决、徹底、准确地粉碎反人民的阶级、阶层和一切反动派对于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破坏和篡夺，不坚决消灭他們的顛复破坏活动，那么人民民主的实行，也就沒有根本的保証。如果反革命分子得了势，篡夺了领导，那他們所要实行的，决不是人民的民主，而是反人民的血腥专政，这点我們在世界历史上，在不久前的匈牙利事件中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証明。

民主和专政两面，虽然是互相密切联系的，但同时又是有区别的。区别首先是在于对象的不同。对于革命人民自己必須实行民主，不能实行专政，如果对革命人民自己实行专政，那就是严重的錯誤。当然，在人民内部，是含有矛盾的；但是对属于人民内部性質的是非問題上的矛盾，必須采取耐心的长期的說服教育、民主协商和实行批評自我批評等等的方法，广泛地發揚人民内部的民主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俾能不断地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結。反之，对于敌对的阶级、阶层和一切反动派則必須实行专政，而不能实行民主，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殘酷。在敌对阶级敌对势力和其影响依然存在的条件下，人民的民主，只能是革命人民的阶级性的民主，在这时候，說什么“全民的”，“純粹的”民主，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騙人的話。

第二，正因为民主与专政的对象不同，所以两者發展的进程也不同，社会主义建設愈發展，人民的觉悟性、創造性愈提高，敌对阶级阶层的势力及其影响愈益削弱和趋于消灭，民主也必然愈益發展，愈益扩大，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当阶级区别本身归

于消灭时，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全民的民主制，就可能实现了。可是我們决不能說阶级斗争同样也随着这一进程而愈益尖锐化，专政的一面也同样随着这一进程而愈益扩大，因为，既然敌对阶级的势力和影响已日趋消灭，那么加强斗争和加紧镇压，是对付誰呢？这就必然要造成镇压反革命工作的無根据的扩大化，打击人民自己内部的一部分人，形成镇反工作上面的严重錯誤。

因此正确理解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五

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和专政这两个互相紧密联系的方面，又是因时因地因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表现不同的突出面，并且因情况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地发展变化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和专政的两面因为情况不同，一个时候这一面比較突出，另一个时候另一面又比較突出。在一定国度，一定情况下，例如在革命胜利初期或者在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十分嚣张的情况下，专政的方面，一般的說，应当比較突出，当然这专政是依靠广大人民的坚强力量，是以发动人民群众發揚广大民主为条件的。在另一种情况下，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設日益胜利进展、敌对阶级日趋消灭（当然帝国主义的間諜破坏分子，是会伴随帝国主义的顧复侵略陰謀而繼續積極活动的）的情况下，則就应当而且也可能在国内愈益突出和強調民主的方面。因为人民内部民主的这种进一步的发展，無論就建設社会主义或往前建設共产主义的事業說，或是就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彻底消灭帝国主义間諜分子和反革命殘余分子的活动說，都是非常必須的。不随着社会主义建設情况的发展而更加發展民主，那就是錯誤的。

每个社会主义国度必須通过同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具体条件相适应的形式，去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去不断地發展和改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可是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發展时期的不同和情况的变化，人民的民主所采取的形式、方法，也必須是發展的变化了的。例如我国建国初期，在中央一級采取了各民主党派和無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协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的形式，在地方也采取了經过协商的地方人民代表會議的形式。在那时劳动人民的广大群众尚未充分發动起来，全国性的土改运动尚未完成，群众性的鎮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範圍內尚未应有地貫徹进行等等的情况之下，这种形式是最恰当的民主形式，也是当时条件所允許的實質上最民主的形式。經过各种偉大的政治运动，伴随着情况的發展变化，建国初期的民主形式就不够了，因之必須在政治协商會議繼續存在并起应有作用的情况下，在一九五四年进一步成立了全国和各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时人民代表大会同政治协商會議一起存在的形式就成为最适当的民主形式和这种条件下最民主的形式了。可是我們不能因此作出結論，說建国初期沒有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不民主。實質上，在那时情况下，沒有成立人民代表大会而只成立政治协商會議才是当时条件所允許的實質上最民主的形式。

再例如：在我国建国初期，根据当时知識分子中各种非無产階級的思想影响严重存在的情况，強調地提出了并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工作，广泛地認真地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这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經过了七、八年，随着我国經濟政治各方面建設工作的發展，思想改造工作的进展，广大人民的革命觉悟和判別能力的提高特別是知識分子本身政治觉悟的提高，就有了条件可能而且必要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这时如

不提出和不实行这一方针，便不能更好地推动科学文化思想的发展，便会是一种错误。可是我们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我国在建国初期没有提出这一方针，或者说在另外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提出这一方针，就是不民主，就是错误，因为就我国说，在那时的情况下，如果贸然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那么就不仅不能很好地发挥人民智慧，推进科学文化思想的发展，反而会招致混乱科学文化思想、浪费人民智慧的恶果。在我国那时的情况之下，强调实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才是实质上最民主的正确方针。自然，现在所提出和实行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并不是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自我思想改造，而是要求依据多方面的更丰富的研究来进一步创造性地展开这一学习，和更好地进行自觉的自我思想改造。

因此，人民的民主的实质，在不同情况下可以表现于不同形式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民主的形式、方法决不是呆板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必须按照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因此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最高利益，按照具体情况，采取当地、当时、当事最适当的也即是可能条件下最民主的方针、形式、方法。

*

*

*

总之，我们研究民主与专政的问题，须要根据实质，按照情况去研究，一句话，我们须要唯物辩证地去研究。不这样，我们是容易陷于片面性，甚至陷于迷惘和错误的。

論資產階級的民主和 無產階級的民主

一 好一个預言家

差不多一年以來，攻擊和毀謗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議論，甚囂塵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民主”歌手們，唱出了各式各樣的調子來指摘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來頌揚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說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是如何不好，說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是如何的美妙，他們利用了匈牙利事件，在國際範圍內製造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歇斯底里。他們“預言”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民主國家，一定要垮台等等。這樣的預言家之一，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先生，他在这方面陸續地發表了好多次議論，例如，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一日在華盛頓的一次談話中說：“共產黨的方式是讓什麼東西都由國家控制，然後着手實行一個計劃得很仔細的十分龐大的宣傳計劃——然後每個人都順從”。“它的大弱點是在緊急的時期，譬如當居民中受自由的情緒發展到超過害怕他們背后的槍炮的情緒的時候，這種獨裁就要垮了”。“在戰爭中間，當害怕前面的機關槍的情緒發展到超過害怕后面的機關槍的情緒的時候，獨裁制度的軍隊就開始瓦解了”。“我們（指美國——作者）的道路是一條不同的道路。我們集合着一億六千八百萬人民的主動精神、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力量。有時它似乎顯得遲緩和累

贊——軟弱，但是事實是，因為所有的危機都對付過去了，而且根據絕大多數的意志採取了行動，情況愈困難，它團結得愈緊，整個的效率也愈高”，等等。

當然，要想使美國壟斷資本的代表而自己又是大富豪的艾森豪威爾不希望社會主義國家垮台，是決不可能的，但是他的論調並不新穎，正如其並不奇怪一樣。早在三十九年前，列寧就已經揭露這樣的說法道：“現在，在最富的國家內，花數千百萬金錢推銷數千萬份來散布資產階級謠言和帝國主義政策的最富有的報紙，沒有一個不重複着這種，反對布爾塞維克的論據和責難，說美國、英國和瑞士是以民主為基礎的先進國家，布爾塞維克的共和國都是強盜國家，沒有自由，布爾塞維克破壞民權思想”，等等（列寧：“論國家”，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四一頁）。三十九年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表們總是利用各種事件，採取各種不同花招，來千百萬次地重複着這種濫調。

最近一年以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利用國際上的某些事件，來更狂熱地重彈這種老調，來對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攻擊。不僅艾森豪威爾、杜勒斯以及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們進行了這樣的攻擊，而且一些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也在為他們幫腔。在這樣的進攻之下，我們共產主義的隊伍中甚至也有些人模糊起來了，這就使得對於這種舊腔新唱的論調進行分析回答，成為一種必要了。

二 如此“民主”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所如此夸耀稱頌的資產階級民主是什麼一回事。

資產階級民主在歷史上的反對封建主義、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中，曾經有過進步作用，它較之中世紀的制度，曾是個巨大